

## 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

## 黑土地上的“红地盘”

■王小明 周一

抗战时期的北满地区，指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路沿线、松花江流域广大区域，大致对应如今黑龙江省除牡丹江市以外的地带。九一八事变后，北满地区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先后组建义勇军、红枪会、反日山林队等抗日游击武装，反帝反侵略的烽火几乎燃遍北满大地。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迁至哈尔滨，进一步强化北满地区的组织领导与宣传动员工作。各阶层群众纷纷以人力、财力、物力支援抗日武装作战，尤其是珠河、汤原等地创建了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游击根据地，成为北满抗战的核心力量与战略基地。

## 扎根黑土，创建根据地

1934年1月，珠河县游击队遵照上级指示，北上越过中东路铁路线，在路北的宋家店、秋皮屯、三岔河一带打击敌伪武装，逐步控制部分要点，为建立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奠定了战略基础。同年年中，中共满洲省委指示珠河中心县委和游击队，要扩大群众性抗日斗争，在反日会、农民委员会、农民协会等组织基础上建立民众政府，由此全面拉开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序幕。

建立政权，先强组织。珠河中心县委依托已占据的部分村镇，在1934年底至1935年初的短时间内，筹建了道北、道南、亚布力、双东、苇河、延方等区委，并在近10个县的范围内组建起60余个党支部，发展党员300余名，极大增强了这一地区的组织力量。随后，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游击队每开辟一片游击区，便在当地组建农民委员会，并在委员会内部设立生产部、拥军部、惩反部、武装部、妇女部等机构，使其成为拥有相对完善行政职能的地方政权。

几乎与此同时，与珠河县遥相呼应的汤原县，也逐步推进根据地建设工作。1933年底，汤原中心县委恢复后，迅速组织起抗日游击队，在县城北面的太平川一带肃清伪警察自卫团和地主武装，为建立根据地扫清障碍。战斗结束后，党组织安排部分游击队员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政策，使这一地区的抗战形势大为好转。至1934年末，以太平川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基本被党领导的抗



朝阳山东北抗联第三路军密营内复原的地窖子。资料照片

日武装控制，被组织起来的群众纷纷参与建设被服厂、兵工厂、密营等后勤基地，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在根据地内部，我党高度重视落实利民政政策与开展宣传教育。比如，将大地主、大汉奸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并免征土地税；推行明确统一的累进税制度，让群众合理承担根据地建设所需的财力、物力，对贫苦者直接免税；禁止大部分农产品外运，以保障根据地经济稳定和群众基本生活。随着群众生活质量逐步提高，多所革命学校相继设立，专门招收贫苦群众子女入学。珠河党组织还创办了《哈东人民革命报》，成为群众了解党的政策、游击队战绩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窗口，极大增强了根据地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这片抗日游击根据地也被大家自豪地称为“红地盘”。

## 挣脱包围，打出新领地

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给当地日伪政权造成极大威胁。从1936年起，北满一带的敌军沿呼海铁路部署重兵，以哈尔滨、绥化、海拉、北安为中心频频发起“讨伐”作战，妄图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与抗联武装。1938年“三·一五”事件后，北满地区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抗联部队损失惨重。在这一极其危险的局势下，中共北满省委两次召开常委会，全

分析战局态势，最终定下跳出敌人包围圈、向黑龙江平原开辟新游击区的决心。会后，北满抗联主要领导者李兆麟、金策、魏长魁、冯治纲等人立即召开军队干部会议，部署展开西北远征。

与东满、南满、吉东等地抗联部队的西征不同，北满抗联的西北远征并非是为打通与其他部队的联系，而是为寻找敌人薄弱环节、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因此，在部队组织与路线选择上，此次远征灵活性更强，收效也相对显著。从1938年年中开始，远征分3批实施，由抗联第三军、第九军、第六军、第十一军等部队分别执行，先后从依兰、汤原、富锦等地出发。经过数月艰苦行军与战斗，部队虽承受了一定损失，但最终均抵达海拉尔附近会师，成功实现中共北满省委的战略意图。

至1938年末，北满抗联部队在海伦组建西北临时指挥部，由李兆麟、李熙山分别担任政治、军事负责人，统一领导这片新游击区的抗日斗争。这次远征不仅打破敌军妄图彻底消灭北满各抗日游击根据地的阴谋，保存了北满抗日武装主力，还在很大程度上策应了其他战略方向上抗联部队的游击作战，为黑嫩平原游击战争的开展奠定基础。



## 伟大胜利的战略基地



上图：元至正十一年火铳。

资料照片

右图：明朝“凤阳行府”铭文铜手铳。

资料照片

## 巧射飞弹破敌阵

## ——中国古代火铳中的单管手铳

■曹波

在中国古代火器中，突火枪是初代管形火铳，以竹筒为枪管，内装火药，用“子窠”（即弹丸），通过点燃火药将弹丸射出，已具备近代枪械的基本要素。然而，竹制枪管易损坏，严重限制威力和使用寿命。在此基础上，古人研制出更耐用、威力更强的金属管形火铳，这种火铳在元朝和明朝前期被统称为火铳，又称“火筒”。

火铳沿用突火枪的发射原理，改用铜或铁铸造枪管，是中国古代第一代金属管形射击火器，其基本结构主要分为前膛、药室和尾盖3部分，能承受更高膛压，射程与杀伤力均有显著提升。火铳以火药发射子弹、铅弹和铁弹，发射时，先将火药从铳口装入药室，再把散状弹丸置于前膛，以火绳为引子，通过火门点火引燃火药，进而射出弹丸。

按造型划分，小型火铳为单兵使用的手铳，大型火铳则发展为铳炮体系，如城防、水战所用的碗口铳、盏口铳等。按管数差异，火铳可分为单管与多管两类。单管火铳以常规手铳为代表，结构简洁、操作便捷。多管火铳通过集束式设计提升火力密度，包括三眼铳、四眼铳、七星铳及子母百弹铳等，部分可一次发射上百枚弹丸，形成大范围杀伤。按发射形式，火铳又可分为单发、连发与多发3类。单发火铳需逐次装填发射，连发与多发火铳则通过多管并行或分段装药设计实现连续射击或齐射，显著提升作战效率。在品类繁多的火铳家族中，单管手铳是该体系的技术基础，它既是明朝前期军队的主要装备，也是后续多管、连发火器发展的源头。本篇将主要介绍各型火铳中的单管手铳及其代表性制品。

手铳为单兵手持式金属管形射击

火器，初创于元朝。元至正十一年火铳，是元朝单管手铳的代表性制品。此火铳为铜制，全长43.5厘米，口径3厘米，铳身表面铸有6圈加强箍，其中铳口外沿及前膛部位3圈、药室上下2圈、尾盖1圈，药室设计为球形隆起结构，尾盖呈中空状，铳体铭文包含“射穿百札 声动九天”及“至正辛卯”铸造年份。

由于手铳比突火枪威力更大、更结实耐用，因而被元军和元末农民起义军广泛应用。元至正十四年，朝廷派淮东宣慰使纳速刺丁率部进攻张士诚起义军，作战中元军大量使用手铳。元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率20余万水军与陈友谅部60余万大军在鄱阳湖展开决战，针对陈友谅部巨舰联阵的弱点，朱元璋将战船编为20队，采用“火器为先、梯次攻击”战术作战，手铳作为核心远射火力置于第一攻击序列。战斗中，明军率先以手铳齐射，压制敌船甲板火力，敌船逼近至百步时，再以火箭纵火、弓弩补射，形成三重火力网。尤其在康郎山激战中，常遇春部以手铳压制敌舰舷侧火力，为敢死队实施火攻创造战机，一举焚毁陈友谅旗舰及20余艘战船。鄱阳湖之战中，手铳凭借射程优势与相比冷兵器更强的穿透力，成为朱元璋部取得战场优势的重要武器。此战后，朱元璋更加重视火器作用，手铳被列为军队制式装备，开启在明朝前期长达百年的极盛时代。

同元朝手铳相比，明朝洪武年间的火铳制造工艺更为精细，表面光滑，外形美观，铳管加长，长度一般为40至44厘米，口径减小，一般为2至3厘米左右，药室至铳口壁厚逐渐递减。

明永乐年间，为提升装备水平，朝

廷大力推动手铳制造产业发展，促使手铳的性能与产量均取得长足进步。从出土实物看，永乐手铳比洪武手铳又有诸多改进：这一时期的手铳更加小巧轻便，易于士兵携带，口径多为14至15毫米，长度为35至36厘米；构造更为合理，铳壁前薄后厚，外形上前细后粗，这种设计既减轻整体重量，又确保药室部位承受更大膛压，实现轻便性与耐用性的兼顾；在手铳的火门外增加一个活动盖，用时可以打开，不用时可以关闭，以保持药室中的火药处于洁净、干燥的待发状态；增配一定量的装药匙，使每次装填的火药量相等，保证弹丸射出后的威力和发射时的安全。

明朝手铳数量庞大，形制多样，除上述列装较多的常规单管手铳外，不乏一些经典之作。

无敌手铳与常规手铳的基本结构类似，但在尺寸与重量上明显加重，总长可达73.4厘米，口径31毫米，重量约150两。弹药威力方面，无敌手铳所用弹丸重达近4两，具备更强穿透力，与杀伤力，能有效击穿敌军甲冑或防御工事。生产与制式上，无敌手铳由兵仗局统一铸造，铭文标注编号、年份与“无敌”字样，实现标准化批量生产，供边军使用。战术定位上，常规手铳多装备于

## 勇战黑嫩，抗联薪火存

1939年1月，刚抵达海伦的北满抗联部队，在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指导下，总结原根据地斗争的经验教训，迅速深入开展宣传与动员工作，力求将即将展开的平原游击战与地方群众工作紧密结合，掀起北满地区新的抗日高潮。为完成这一任务，临时省委派出精干力量在龙江、讷河等地建立党组织，并指导当地成立抗日救国会，将其作为团结带领群众支援游击战争、建设后方基地的重要组织。

同年5月，为统一北满抗联部队领导，加强与抗联第一路军、第二路军的协同配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二次全会决定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由李兆麟担任总指挥。随后，总指挥部下设龙南、龙北、下江3个区域性指挥部，分别指挥不同方向的游击作战，使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更具层次性，作战效率显著提升。

从1940年冬开始，东北地区抗战形势急剧恶化，抗联各方面军主力相继进入苏联境内整训、补充，但抗联第三路军一部因身处特殊的平原地带，且根据地建设扎实，始终在国内坚持战斗至1942年末，让北满这块“红地盘”的抗日火种一直延续。他们以实际行动揭穿了敌人“抗联已被彻底消灭”的谎言，极大鼓舞群众的抗日斗志，彰显出东北军民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崇高民族气节。

1945年9月，东北抗联随苏联红军开始大反攻，并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9月18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在沈阳正式办公。随后，时任东北党委书记的周保中抵达沈阳，向东北局移交全部组织关系、档案等资料，并汇报了14年来东北党和抗联的战斗历程。东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众多抗日游击根据地，尽管部分根据地存续时间不长、规模有限，但始终是各抗日武装的重要战略依托，更是东北人民坚持斗争、抗战到底的生动见证。

1935年7月2日，红25军按照“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在陕西山阳袁家沟口一举歼灭陕军警备第1旅。这是红25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第二次反“围剿”中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 战略转移到陕南

红25军是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于1932年11月重新组建的一支红军队伍。1934年11月，根据中革军委指示，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红25军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向西实行战略转移。

此后，红25军转战于鄂、豫、陕三省边界的崇山峻岭之间，先入桐柏山，转战伏牛山，最终落脚商洛山中。在沿途历经的大小数十次战斗中，尤其是独树镇、庾家河两次关生死存亡的恶战，红25军将士以钢铁般的意志，打破了10多倍于己的敌军围追堵截，长驱近2000里，成功完成第一次战略转移，在陕西南部站稳脚跟，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并成立了边区苏维埃政府。

红25军在陕南蓬勃开展的革命斗争，让国民党反动派深感震惊与不安，他们绝不甘心红军在此扎根立足。在第一次“围剿”失败后，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命令第40军（辖第115、第116旅），第44、第95师，东北军第67军（辖第107、第110、第129师）和陕军第38军一部及警备第1、第2旅等部，共30余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及红25军发动第二次“围剿”，限令在3个月内将红25军全部消灭。

5月上旬，敌军部署完毕，开始分进合击。敌第67军和第95师自商南及其以东地区向南进攻；第44师自湖北郧西上津一带向北进攻；第40、第38军和警备第1、第2旅等部在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线布防，从西面堵截红25军。

红25军及时察觉敌人的行动企图，立即结束在商县龙驹寨的备战整训，于5月中旬南下郧西地区。5月19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召开第二次反“围剿”的准备工作。5月下旬，省委再次在郧西召开会议，决定乘敌第67军立足未稳之际，抢先北上，争取歼灭其一部，随后采取“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以盘旋式“打圈”的机动调动敌人，待敌被分散、拖至疲惫状态时，再选择有利战机和地点，集中兵力歼灭其一两个师（旅），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

## 调动敌军寻战机

红25军根据鄂豫陕省委的作战方针和计划，于6月初从郧西二天门出发，北上商县地区，随后穿插到敌第67军侧后的雒南庾家河一带。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迫使原本向南进攻的敌军掉头向北。此时，因敌军主力较为集中，难以分割围歼，红25军放弃先打第67军的计划，掉转头向东南快速前进，继续向外线机动，以调动、分散和疲惫敌人。6月中旬，红25军包围商南县城，攻克富水关，进占青山街，并于16日袭占敌第44师后方补给站荆紫关。消息传来，敌第67军、第44师和警备第1旅等部纷纷向荆紫关蜂拥而来，企图寻找红25军主力决战。

此时，敌人原本的“围剿”部署已被彻底打乱，部队被拖得疲惫不堪，逃亡、减员情况严重，士气低落，仅敌第44师多数连队就减员三分之一以上，但红25军面临的敌军仍较为强大且集中。为创造有利战机，鄂豫陕省委和红25军领导决定甩开密集之敌，继续挥师西进，进一步分散和疲惫敌人，诱敌深入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再伺机集中兵力歼灭其中一路。

6月17日，红25军从荆紫关出发，避开敌第67军和第44师的堵截后，连日沿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急速西进。敌第67军、第44师和警备第1旅立即掉头尾追，敌第38军和第40军一部则进到漫川关、上津一线堵截。22日，红25军在山阳姚家湾击退敌第40军一部的阻拦后转向西北，于25日抵达根据地边缘的黑山街。至此，追堵之敌都发射时，人须屈前膝架铳，拔去枪头，点燃火线，发射弹丸，射毕后，将枪头装上，作为长枪刺敌，克服了普通手铳装填发射慢而容易被敌军利用装填间隙发起近距离进攻的弊端。

连子铳是明朝嘉靖年间创制的一种连射式单管手铳，铳身铁质，后端安有木柄方便握持。其自铳膛中部向后留开间隙，依次装填若干用纸筒包好的火药并以引线相连，铳身开一圆孔，采用上供弹方式，即有一个类似弹夹的装有铅弹的铁管垂直插入，并让第一枚弹丸在铳膛中与火药筒相接触。发射时，先点燃第一火药筒中的火药，将一枚弹丸射出，后续弹丸会因重力依次落下，并被后续火药筒燃射出去，这样不仅实现了弹丸自动装填，还提高了射速，设计非常巧妙。

到达黑山街后，红25军初步决定在小河口一带伏击敌人，提出“哪一股敌人先到，就坚决消灭哪一股”的口号。据此，全体指战员不顾数十天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紧张投入战斗准备，斗志昂扬。活动当地的第3、第4路



## 红二十五军袁家沟口歼敌军

■胡遵远 陈仁喜

游击师和地方党政组织也积极行动，带领群众侦察敌情、封锁消息，组织担架队、运输队，全力配合主力红军作战。4天后，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6月29日下午，敌警备第1旅（辖2个团）进入黑山街附近。军首长当即决定伏击该敌。为吸引敌人深入根据地中心区，红25军以小部队与敌接触后，边打边向预设伏击地域小河口撤退。到达小河口后，经现场勘察，发现此处地形不利于伏击，便决定继续西进，抵达袁家沟口、桃园岭一带。

## 设伏歼敌破“围剿”

袁家沟口到桃园岭是一条长达5公里的山沟，两侧山高峰密，沟底的小路是敌人必经之道。红25军首长考虑到这里地形有利、群众基础好，当即确定以这一带为伏击战场。为继续诱敌深入，红25军经桃园岭向西北撤至红岩寺。

7月1日，敌警备第1旅追到袁家沟口。红25军首长查明这一情况后，即率部队连夜轻装返回桃园岭及其以东地区设伏：第223团占领袁家沟口北面一线高地；第225团两个营占领袁家沟口西南的东沟、李家沟南侧高地，另一个营在桃园岭狙击敌人；第3路游击师控制袁家沟口东南山，以切断敌人退路；第4路游击师配置于牛耳川附近，担任对战场南面的警戒。

7月2日拂晓，红25军各部队进入指定位置。晨雾弥漫中，发现敌人正在袁家沟口村西集合，尖兵已出发向西前进。红25军首长当机立断，适时发出总攻击命令。设伏部队突然向敌密集队形开火，发起猛烈攻击。第223团从北面高地猛冲下去，敌军遭此突袭立即乱作一团，一部占领村庄负隅顽抗，企图掩护主力展开并组织反扑。一度激烈的白刃战后，第223团歼灭敌人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向西南山上逃窜，又遭到第225团的迎头打击。在第223、第225团的前后夹攻之下，敌军大部被歼。敌旅长率残部向东南方向突围，又遭第225团和第3路游击师阻击。残敌占据一小寨子顽抗，在红军的多次猛攻下，到午后被全部歼灭。

袁家沟口之战是红25军长征途中的经典歼灭战，一举全歼敌军“围剿”中行动最为猖狂的陕军警备第1旅，毙伤敌团长以下300余人，俘敌旅长以下14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0挺、长短枪1600余支。

战后，红25军乘胜东进，佯逼商县，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全面粉碎敌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进行的第二次“围剿”，彻底打破敌军3个月内消灭红25军的狂妄计划。

位于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袁家沟口的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纪念碑。资料照片